

台灣和香港之間

建築教育的觀察與實踐^{注1}

文／王維仁



王維仁
香港大學建築系教授暨系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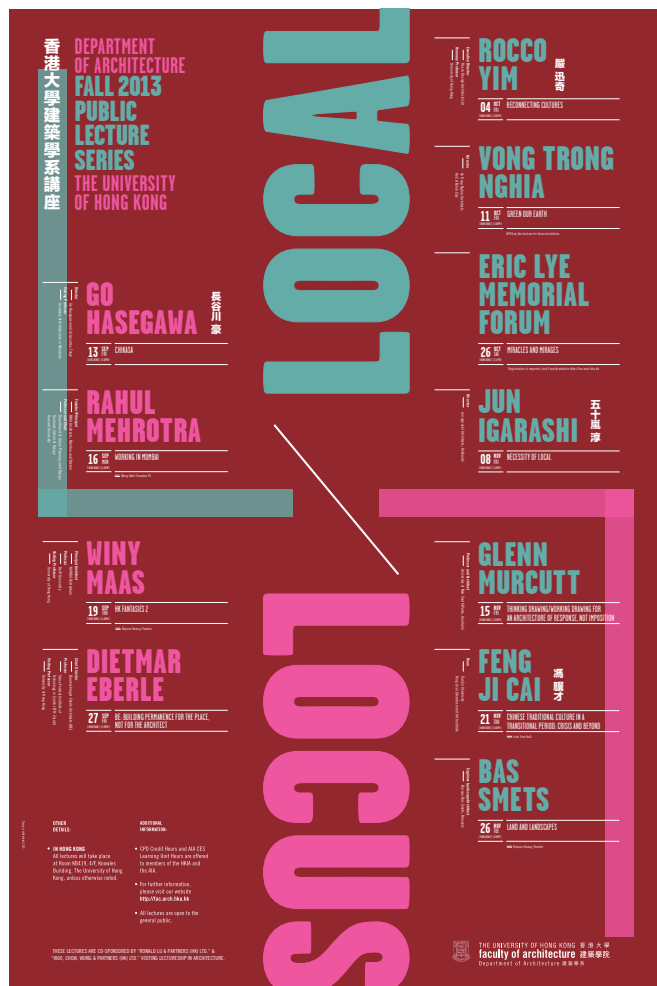
一、當代建築形式與理論問題

六十年代以後，戰後歐洲的人本主義加理性主義，以及美國的後現代論述，對現代主義後期的國際樣式進行了道德批判，強調建築回歸城市與環境。九十年代以後，後現代主義掉入歷史形式窠臼而失去生命力，建築理論也進入了價值真空的時代。最近的二十年，建築理論失掉了人本和道德的制高點，對社會和資本的批判性不再，淪為形式的附庸，既沒有反映日益尖銳的社會環境問題，也沒有真實的參與建構。

英美學院派的形式和理論相互寄生，人的價值變真空了，前衛建築失去了本體的材料和建築技術，熱衷於借用理論的附會形式，切斷了建築和人與自然的根本關係。從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ism）、極簡主義（Minimalism）到數位構築（Digital Fabrication）等等，僅表現了形式與形式的理論（Form Theory），以及特定的藝術取向。在英美體系的學院裡，失去本體價值的建築，只是借用其他學科的理論，讓建築論述淪為英文語言結構下的理論形式操作。藝術的取向當然一直是建築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從包浩斯開始即為如此，今日這些學院派致力將藝術取向的建築再現（representation）作為論述主題，取代建築核心的實體建造與空間生產，並將建築的再生產（reproduction）形式化約為理論與展覽，成



2013年春季香港大學建築系講座海報。



2013年秋季香港大學建築系講座海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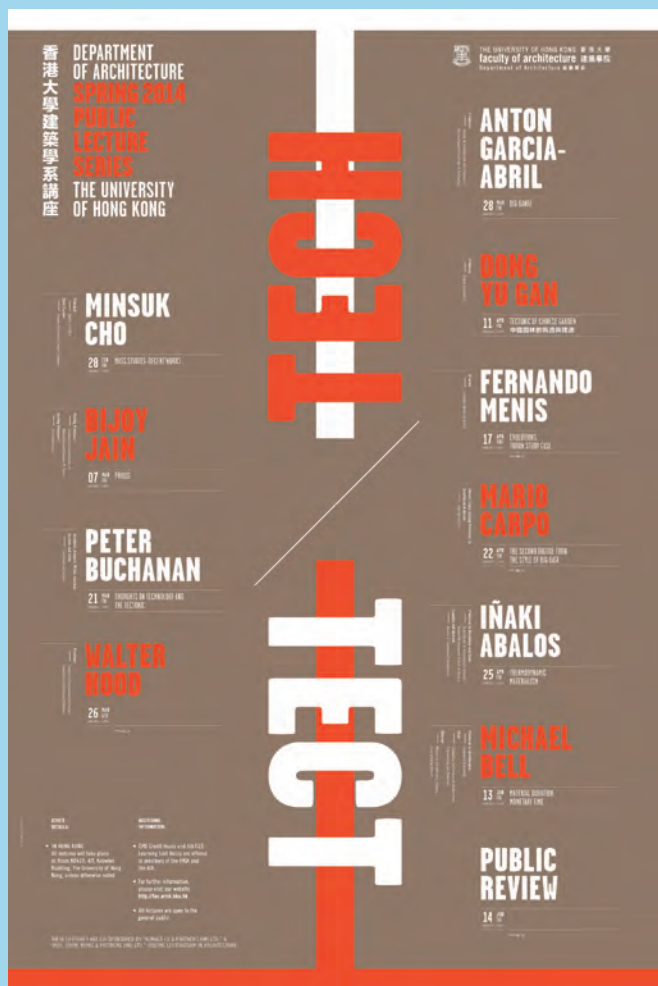
為建築論述最重要的部分。這種藝術取向使得建築跟科技 (technology)、人 (human condition) 與環境脫鉤，建築成了一種展示與再現的藝術。

九十年代末期，都市地景主義 (Landscape Urbanism) 比較間接的試圖將建築理論從藝術再現，拉回建築與生態環境的關聯。同時數位建築的信仰者，也利用 grasshopper 等參數化的軟體的發展，將三維曲面的造型極至化，快速成為市場與權力需求的形象建築 (iconic architecture) 之主力，經由借用理論的形式理論造形的藝術取向，因應資本全球化的商品創新需求，以及城市行銷的文化表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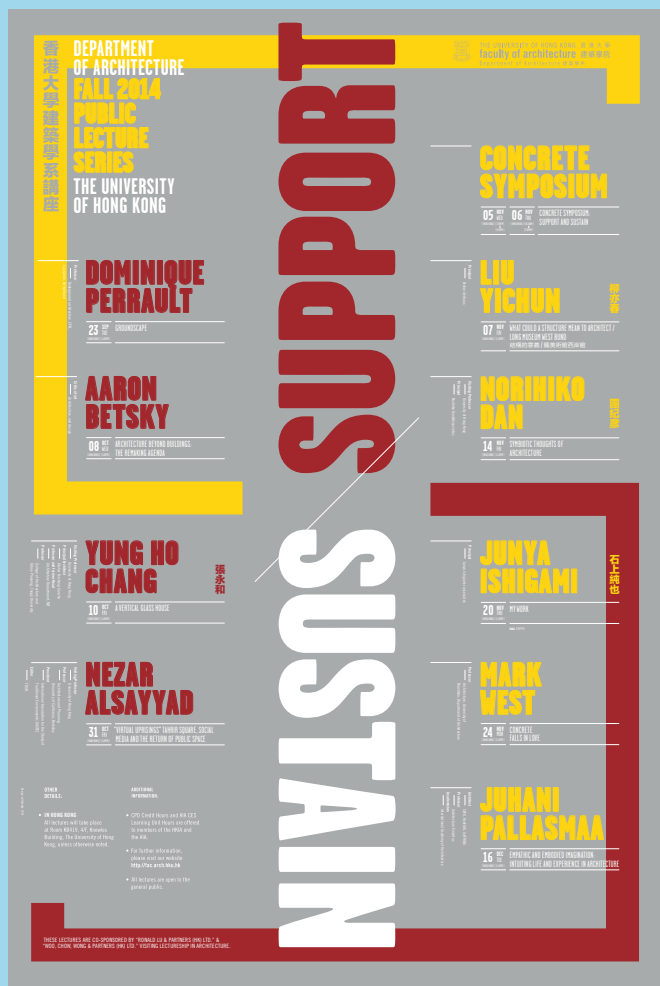
其實英國除了幾家前衛的學院派，其他很多學院仍然保留了技術尖端的建築傳統，維持著進步的建築結構和建構教育，持續訓練出像佛斯特這類型的建築師，懂得如何把建築構件和細部整合得很好，所以我們今日看倫敦市區的高樓建築，

利落的玻璃帷幕仍然是領先美國一大截。而我們再放眼在歐洲，無論是中歐的瑞士、德國，或南歐的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北歐的瑞典、芬蘭，延續 Technical University 的建築學校都有優良的工程傳統，能將建築的空間美學與建構，跟工程技術結合在一起。歐洲建築師即使同樣受到二十世紀末後現代主義的影響，這項結合建築美學與工程的傳統，如 ETH 蘇黎世理工學院等學校，仍是今日歐洲建築教育的主流，一代代優秀的建築師持續蓋出好的建築作品。反觀美國的建築學院派，這二十年來作為前衛形式與理論的重鎮，重視建築再現與論述甚於建築，多年來美國建築師與歷屆的普利茲克獎緣分不多，就是最好的明證。

相對於這二十年來的美國建築的理論風潮，面對全球的環境危機，歐洲的建築發展是著重建築的永續性 (sustainability)，除了先進的綠建築實踐，也包括舊建築的調適再利用，都成為歐洲建



2014年春季香港大學建築系講座海報。



2014年秋季香港大學建築系講座海報。

建築師的基本技能與主要的設計態度。由這個角度來反省，戰後長期受美國影響的國家，亦步亦趨的學習美國的建築風潮，不注重建築本體的建構技術和永續性營造，反而似懂非懂的談論似是而非的理論，模仿過時的時髦，在我認為是沒有清楚策略的教育方向。

二、香港大學與建築教育的定位

香港建築長期受到英美的影響，全球化與市場化程度高，資本的集中與大規模的批地政策，形成了大發展商加大建築師樓的商業建築文化，使得香港難以形成小眾的、批判的建築。面對香港追求卓越的企圖，香港大學的建築教育該怎麼

走？

近十年來，港大建築系的教育模式，可說是當代美國東岸的延伸。建築學院的前院長是普林斯頓的前院長，帶來很多美國東岸和英國的年輕教師，使得港大的設計課程，在方法與技術上與倫敦和紐約接軌，無論是形式的論述或圖面的表現法，都和當代的英美潮流同步。然而我們從更長的歷史來看，港大在二或三十年前不也是相對的和英美接軌同步嗎？這三十年以來我們訓練了多少世界一流的建築師？作為和英美建築教育同步的香港大學，除了亦步亦趨的跟緊英美潮流，我們的自我反省在哪裡？我們如何能走出更好的建築教育之路？二十一世紀中國的發展提供了我

們怎樣的建築機會？世界上還有哪些建築教育的模式可以提供我們啟示？我認為一個一流的建築系一定要有自己的東西，自己清楚的教育遠景與方法，否則學來學去只會是二流的。

首先要利用現有機會，思考正在中國的大興大建中，哪些是關鍵的議題？如何藉此提升建築的設計與技術的質量？譬如從這個地域的營建體系，可以發展怎樣的建構（Tectonic）美學與技術？在生態環境持續惡化的中國，從這個地域的營建與環境特色，可以發展何種可持續設計策略？這是我們容易發展特色與卓越，並且必須做好的。譬如在中國當下嚴峻的社會狀態下，建築如何成為反映社會與意識形態的先鋒？

經營一所好的建築學校一定要有自己的方向，這個方向要配合自己的特色，這個特色必須夠獨特，我的意思是創造自己的卓越，必須通過自己的特殊性達成，所以我們要先掌握自己的特殊性。回到港大的背景來看，我認為建築教育不只是去學習一種自己不熟悉、不屬於自己建築傳統內的東西，在我們的建築傳統裡，從來不會虛無飄渺的談建築，我們的建築傳統是工匠與園林的傳統，也就是空間經驗與知覺，這些都不是玄學的傳統。從香港與中國的環境來看，建築的教育與實踐必須面對都市的高密度、住宅、大尺度的環境問題，建築的教育與實踐也必須著眼農村與生態，提出與中國高速發展帶來問題相關的對策。如果這個世紀的建築要回歸生態環境與建造技術，追求人本價值和環境價值，我們在建築教育上更需要持續強調好的人文與工程傳統。

三、從香港看台灣的交流與開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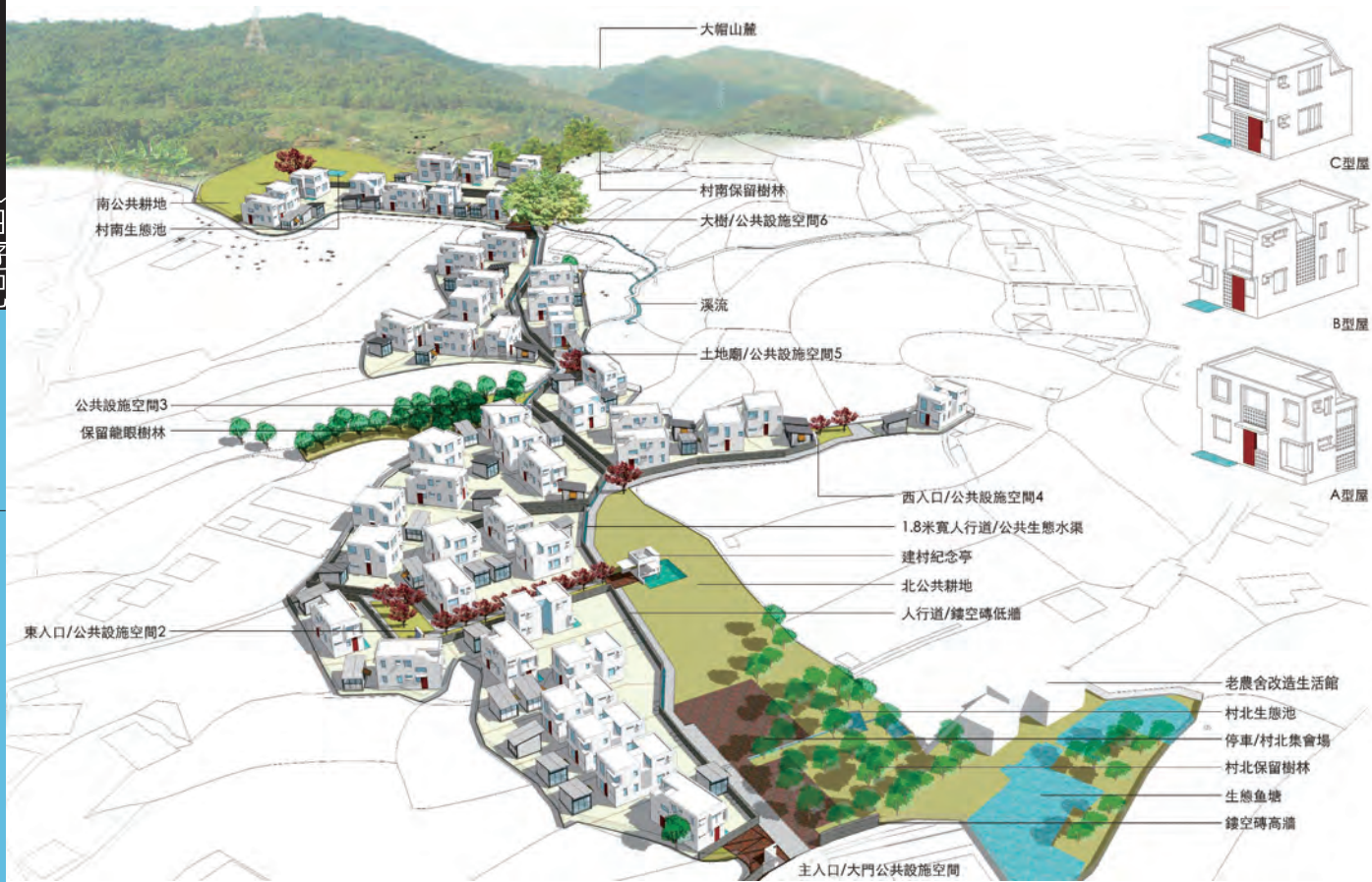
八零年代我到美國留學，加州柏克萊建築學院給我的經驗，是從更寬廣的視角，思考全球性的、社會性、都市轉變過程的建築問題，讓我不以歐洲為中心的歷史與菁英主義，而是從更豐富

的人類學、文化地理學的視角來看建築。我更理解到，西方的批判性地域主義，並不是一種地理上狹義的地域主義，更是從一個世界的觀點，對人類文明同質化扁平化的反省。我們必須察覺到西方的建築理論持續轉變中，哪些是我們可以參與貢獻甚至領導方向的，哪些是虛虛實實應該被我們批判的。反觀我們在學院裡所接觸的教材，不能停滯在我們的老師初始接受西方理論衝擊時的狀態，而是必須不斷辯證與反省的。

香港比台灣晚五十年解殖，但更全球化資本化與市場化。而台灣在這五十年裡則是同時經歷建構國族與去殖民的過程，這讓台港兩地的建築發展有明確的差異。2007年我在香港辦建築雙年展，特別將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建築作品放到香港展出，我想讓香港看見大陸和台灣正在講出一種非英語、粗糙的、但屬於自己的建築語言，這是香港沒有的，也是台灣應該引以為傲的。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九十年代以來到今天的二十或三十年，台灣似乎仍然處在一種建國初期的狀態，壟罩一種意識形態的建構氛圍，形成了自己彼此相信的一種論述，而少了一些與他人交流、反思自身的平台。我從香港看台灣較能看見這種論述相對單一化的缺點。除了自己，台灣幾乎只有美國和英國學院派的影響，這正是反映了台灣文化缺少對世界的開放性，而不只是美國。若從留學的視角來說，台灣人出國留學的方向太單一了，主要是到美國加上部分少日本，反觀亞洲其他國家，像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就往全世界看：你看宮崎駿的電影描述飛機設計的學習，除了英國，更是德國法國和義大利等等，這種看世界的方式，勢必會影響我們看建築的視野。

也許因為我身處在台灣的外圍，在論述上得以獨立，也逃脫了台灣的圈圈所建構的共識。持續學習並獲得更寬廣的視野，這是學習建築必要形成的世界觀與持續冒險的勇氣。



菜園村全區規畫模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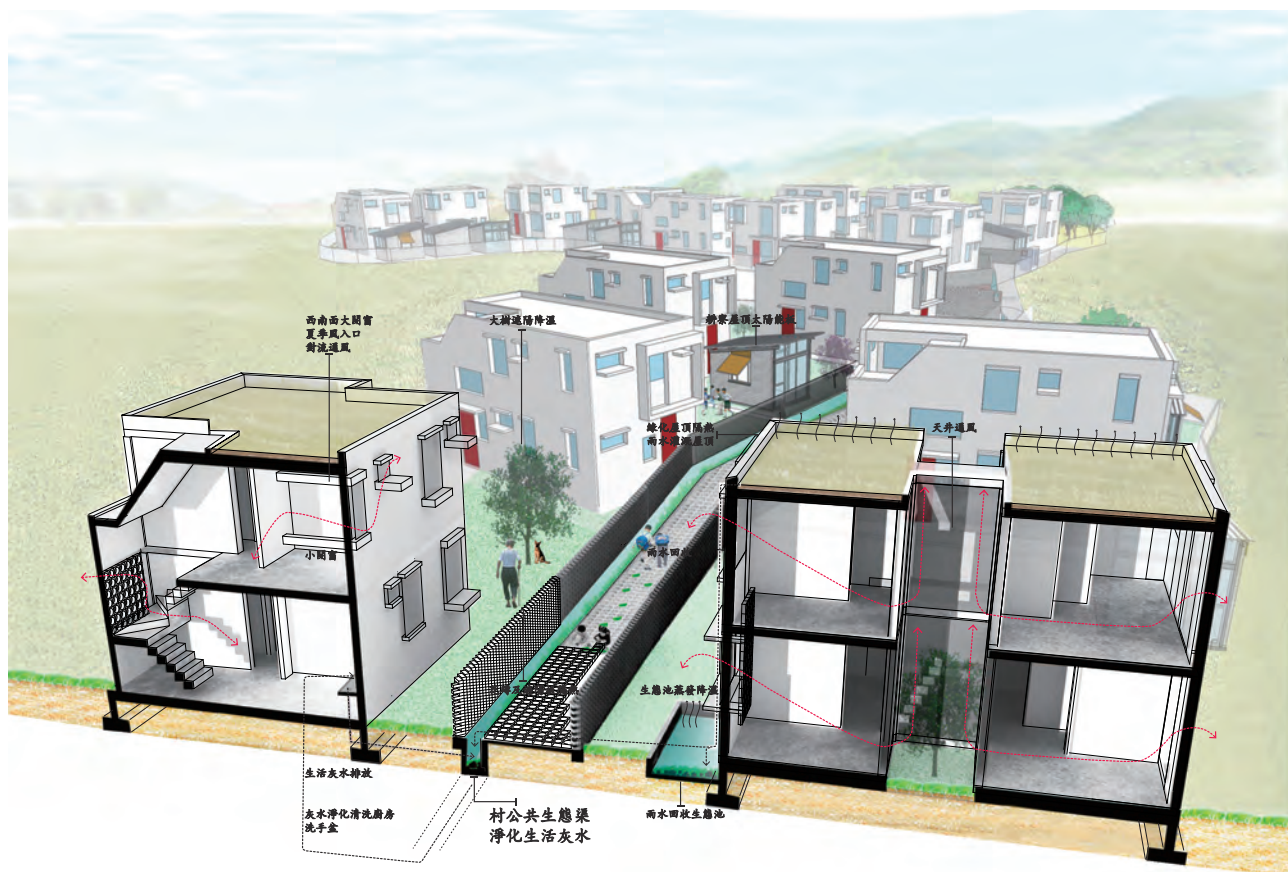
四、由菜園村規劃看人與環境的建築專業

菜園村是為被拆村的香港弱勢社群建造新的家和社區，讓我回到二十幾歲時對建築懷抱的社會主義情懷，更讓我學習到很多東西：不但是理想和現實的妥協，更是設計的時候什麼該抓住，什麼可以放棄；什麼是生活的美而什麼是視覺的美？

建築的光譜一端是草根於社會性，另一端是菁英的專業經驗，無論是菁英主義或草根主義的建築實踐，都要回歸人與環境的生活與美感經驗。從我在香港菜園村和很多其他設計的經驗來看，在參與設計的建築實踐過程中，我們會面對不同的對象與業主，各種不停的需求與欲望，關鍵在如何不能人云亦云，而著眼於公共與長遠的利益。就像是為一個修道院作建築設計，我不會只滿足當下某個修道士的偏好，還會考量到一百年後來此修道院的修道士，是否同樣能感受到精神上的啟迪。另一種複雜的專業情境是，當我們為一群

低收入的人，規劃他們畢生積蓄所能換到的一處遮蔽場所，建築設計的考量將會不同，建築師如何用最經濟的條件，提供他們長期居住的需求，同時能考量到一定程度的環境品質，這必須從建築的本質來談，而不是空談建築的藝術取向。低收入者的住所要先滿足基本的空間需求，並且要夠便宜的在這些空間裡，營造共同生活的關係。設計考慮的是如何跟周圍空地形成一種關係，是將來可以種樹、架棚子，形成比較好的實質環境。設計要思考如何保留周邊原本對好環境有幫助的元素，例如果樹、水塘，讓新的房子經過五年、十年的時間，逐漸與這些好的環境元素融合在一起，這是這樣的設計必須考慮的關鍵。

另一項議題就是參與過程，香港菜園村的計畫是透過地方對政府的抗爭過程成立，空間使用者一開始便參與這種抗爭過程中，因此必須讓這些人得以參與規劃過程。但是這種參與式設計絕對不是某一種相信使用者可以自己作設計的辦法，因為這些人同樣也期待專業者給他們一個好設計，



菜園村單棟住宅規畫模擬圖。

而不是要自己的小孩去參加工作坊、作模型、作設計，這不會是重點。所謂的參與式設計是如何深刻了解使用者的需求，如何對基地的人與物有深刻的觀察，並把自我的設計意識拿掉，掌握關鍵空間的尺度感與人的關係，如何想像它在十年後融合場所成為一個好環境。如果說這是一種草根的專業經驗，因為這種建築在本質上是居住者辛辛苦苦爭取營造空間的機會，包括地方環境的既有元素，以及這些人的本質。

傳統社會本來在村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制約，調整出一種環境的形態，但是現在這個沒有了。我們在過程中發展一種類似「設計聽診」(design clinic)的方法，像是醫生看診，是專業者在這種過程中要想出一個辦法，讓需要長期衍生出來的環境，能在短時間內達成。於是我發展出一種參與的模式，能在短時間內發掘出來村民彼此制約與協調的關係，利用社區對鄰居建築的意見來制約出比較大的公共利益，也對使得這些村民對於居住環境能做出比較適當的判斷，並且在設計過

程能達成調節 (moderate) 的效果。

若從美學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建築光譜的哪一端，即使是最普羅的建築，都能以各種形式營造出永恆的美。就像是在一棵樹下，有幾塊石頭讓人坐下來，這種融入地方的感動，是結合了當地材料的真實感，以及建築元素與人們的活動之間的關係，共同營造出環境的美，這和博物館內佈置了比例和材質精雕細琢的座椅，同樣的都營造了美的體驗。我提出的觀點是：一位好建築師能夠同時掌握這兩種美感的創造，關鍵就是追求回歸人與環境的建築。^註

注釋：

1. 本文根據 2015 年 1 月 4 日星期日 17:00 - 18:00，在台北市辛亥路台大側門口星巴克咖啡館，吳光庭和許麗玉訪談王維仁的記錄，由許麗玉整理，王維仁修改，2015 年 3 月 17 日定稿，首次發表於《臺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第 78 期。